

# 嵇康在魏晋乱世中的道德坚守

高娇娇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省 太原市 030000)

摘要: 魏晋之际, 名士嵇康远承道家“自然无为”思想提出“越名教任自然”的道德主张。“越名教”从“攻”的层面试图冲破失真的儒家名教; “任自然”从“守”的意义上主张构建自然安宁的道家世界。本文在阐述嵇康的道德思想之前, 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了嵇康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他的个人成长经历, 意在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嵇康在魏晋乱世中坚守的道德。

关键词: 嵇康; 越名教任自然; 道德

## 一、魏晋乱世

《孟子·万章下》语: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认为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荣辱息息相关, 只有把嵇康所坚守的道德放置在魏晋时期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深刻地理解它。嵇康所处的后三国曹魏政权(公元220-266年)政治黑暗、兵戈扰攘; 瘟疫肆虐、流民遍野; 世风日下, 道德沦丧。

1. 政治黑暗。自东汉末年起, 先是董卓专断朝廷, 接着是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孙坚、刘表、陶谦、公孙度等人拥兵自卫, 相互攻战, 使中原北国到处是“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曹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 趁大将军曹爽等奉齐王曹芳谒高平陵, 太傅司马懿父子趁机发动兵变, 曹爽、曹曦以及大批名士被残酷的杀害, 史称“高平陵政变”。司马氏手握重权后, 曹魏势力几乎丧失殆尽。魏咸熙二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 国号为晋。从司马懿杀王陵而夷其三族起, 到司马炎的杀张弘而夷其三族, 二十二年间夷三族的就有六起, 社会就像一个人头滚动、鲜血四溢的大屠场。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年代, 皇帝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尊严, 司马氏则用屠刀将皇帝的威严和“君为臣纲”的观念削砍得干干净净。统治集团的内部残杀, 不仅是政敌之间的杀戮, 还表现在对士大夫的迫害上。达到高峰的事件是桓帝、灵帝之时的两次“党锢之祸”, 曹操诛杀孔融、许攸、杨修、娄圭、崔琰等。死亡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艰辛、恐惧, 无情地折磨着人们的身心 and 心灵。

2. 天灾肆虐。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说“终魏晋之世, 黄河、长江两流域间, 连岁凶灾, 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中, 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甚密, 远愈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疫疾之灾, 无不纷至沓来, 一时俱见。”灾荒饥馑, 百姓或人相啖食。曹植也在文章《说疫气》中用令人触目惊心的笔调写道: “建安二十二年, 瘴气流行, 家家有僵尸之痛, 室室有号泣之哀。”瘟疫不仅危及了荆室蓬户的下层人民的生命, 重貂累藤的上层人士也难以幸免。在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中, 建安七子中就有四人殒命。“人生似幻化, 终当归虚无”是那个时代生命稍纵即逝的真实写照。

3. 道德崩溃。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对先秦以来的道德规范做了进一步整理,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吸收其他各家思想, 建构了天人感应学说, 形成以孝为核心, 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该理论围绕着家、国、天下等问题, 提倡以利他精神为核心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完善, 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意味着,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 其价值和意义是从与社会群体相关的角度去判断的。

自汉末以来, 至高无上的皇帝被悍将武夫肆意玩弄, 或废或立, 或囚或杀, 或挟以令诸侯, 国不国, 君不君, 臣不臣, “君为臣纲”的道德观念被残暴的杀戮所毁灭。昔日追名逐利, 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陷入了巨大的悲苦和迷惘之中。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 天与人之间的感应不复存在。人们意识到生命“忽若风吹尘”般的脆弱, 为了抚慰自己痛苦的灵魂, 转向了适情任性的逍遥, 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 各从所好, 甚至任情纵欲。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逐

渐丧失其内在实质而流于形式, “及时行乐”成了当时人们消解焦虑的主要途径, 尽情享受的背后是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对死亡恐惧的稀释。

马良怀博士说, “人们由于自身的属性所决定, 迫切地需要同一定的信仰、价值、符号、模式发生密切的联系, 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来作为道德行为的依据和精神世界的支柱, 而权威思想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而权威思想的崩溃, 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迷惑与混乱, 所以随之而至的必然是对重建的思考和探索。”嵇康刚好处于这样的时代, “旧有道德观念的崩溃催生着人的觉醒”。他不禁思考: “人究竟应该坚守何种道德立场?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带着时代为他写下的谜题, 嵇康用生命写下了答案“越名教任自然”。

## 二、嵇康个人成长经历

本文认为, 研究嵇康的道德坚守, 除了应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环境的因素, 还要从微观上考量他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

嵇康, 字叔夜(公元224-263年), 享年四十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 “案嵇氏谱: 康父昭, 字子远, 督军粮, 治书侍御史。兄喜, 字公穆, 晋扬州刺史、宗正。”《晋书·嵇康传》: “康早孤, 有奇才, 远迈不群。”由上可知, 嵇康的父亲, 哥哥均为朝廷官员。在他年幼时, 父亲去世。母兄对他“有慈无威”倍加宠爱, 以至于嵇康养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 冯宠自放, 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的性格。

嵇康家世儒学, 少有俊才, 后转好老庄。《世说新语·容止》载: 嵇康“风姿特秀,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其醉也, 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其外形高大而俊秀。嵇康的哥哥嵇喜谓嵇康: “好老庄之业, 恬静无欲。……善属文论, 弹琴咏诗, 自足于怀抱之中。……超然独达, 遂放世事, 纵意于尘埃之表。”魏正始中期与魏宗氏婚, 后拜中散大夫。但他不满曹政权的作为, 选择了走向山林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净土。正始八年, 嵇康与志同道合的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人常聚于竹林之下, 肆意酣畅, 谈玄说理, 饮酒赋诗, 弹琴抚琴, 无拘无束, 甚至用惊世骇俗的行动来表示对礼俗的鄙视和对现实的不满, 人称“竹林七贤”。嵇康骨子里流着自由的血, 如他自己所云, “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今但愿守陋巷, 教养子孙, 时与亲旧叙阔, 陈说平生, 浊酒一杯, 弹琴一曲, 志愿毕矣。”但就是这样一个风华绝代, 不染尘世, 心向自然, 超世独步的嵇康, 却成为了曹家和司马氏夺权之局的牺牲品, 令世人无限唏嘘。本文认为嵇康悲剧的背后蕴藏着深层次道德坚守, 故在此对嵇康的死因进行分析。

首先, 嵇康与曹魏的渊源关系(父兄皆为曹魏官员, 妻子为曹操孙女)造成了与司马氏的客观对立。司马氏掌握实权后铲除异己的手段可谓是令人闻风丧胆, 与曹家的关系使得嵇康不免牵扯其中, 但他身处闲职, 无心朝堂。在斗争白热化时入林避世, 醉心山水。本文认为这客观存在的因素不足以使其致死。

其次, 嵇康“遇事便发”主观上与司马氏进行舆论对抗: 写《管蔡论》为管、蔡二人正名, 实则为好友毋丘俭叫冤, 剑锋直指司马师; 在好友山涛举荐他为官时, 答《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 言辞

激烈，惹怒司马昭。除此之外，嵇康不畏权贵，得罪司马氏红人钟会。钟会与嵇康都是少年成名的天才，不同的是钟会站在司马昭的麾下，从者如云的钟会曾去竹林拜访嵇康，而他熟视无睹不为之礼，与好友专心打铁，钟会见状起身要走，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想来钟会是不满嵇康的高傲的，心中甚是愤恨。在嵇康因吕安之事下狱之后，钟会庭论康曰：“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势，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在钟会的谗言下嵇康被处决。

中国社会历来讲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处在司马氏夺取江山关键时期，嵇康非但没有入仕而且站到其对立面上，众多名士愿跟随他入狱，三千太学生为他请命，人在竹林醉酒，风誉扇与海内，嵇康以其强大的号召力，令统治者忌憚。嵇康临行东市时，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曲是不屈的曲，人也是绝美的人，写到此此时，我也不禁自问，是什么让本想脱俗洁身的他来慷生命之慨？是魏晋的“天”太黑了？还是嵇康心中的“火”太亮了？对此，鲁迅认为嵇康“就是过分认真”，“说出来，送掉了性命；忍着又噬碎了自己的心。”但是，嵇康的悲剧不可谓不值，他那种对自然的执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面对死神时的镇定，穿越历史的尘埃依旧熠熠生辉，他像巨人一样，捍卫着心中的理想，坚守着自己的道德。

### 三、嵇康坚守的道德

嵇康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时期。司马氏借“名教”之名构陷无辜，排除异己，将暴力手段掩盖在温情脉脉的“名教”面纱之下。嵇康针对司马氏社会控制的特点，外攻“名教”内守“自然”，提出“越名教任自然”。所谓“名教”，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的总称。所谓“自然”，是指自然而然、天然如此的意思。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关系。

“越名教任自然”这是蔑弃礼法的口号，是一种道德准则和道德境界。也就是说要得到个人的身心自由，就不要被名教所束缚。嵇康嵇康在《释私论》中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他渴望“矜尚不存乎心”，“情不系于所欲”，摆脱名教的束缚，任凭人性自由伸展，回到自然状态。

为了攻破司马氏虚伪名教的围墙，他从以下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张：

#### 1. 非毁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圣人和经典。

嵇康在其论文诗中多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对圣人的非议最明显地表现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一段议论孔子的言论：“或修身以明污，显智以惊愚，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海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途，俯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内视反听，爱气蓄精，明白四达，而无执无为，遗世坐忘，以实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嵇康笔下的孔子不过是一个为了名利四处奔忙的势利之徒，全然没有了儒家圣人的崇高。

嵇康根据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观点进行思考后提出“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他认为，在自然状态遭到破坏后，才开始用“文”来“以传其意，区别群物”。相应的，“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制定仁义道德，并通过教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约束人们的身心。“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则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就

此礼学矣。”“仁义”、“廉让”产生于“理伪”、“争夺”，并非基于“自然”，其目的是调节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天性丧真。”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繁多的礼仪和刑罚应运而生。教化的推行使人丧失了本真的素朴状态。这样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是道德衰落以后的产物。

嵇康在“道德人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儒家经典摧残人性的本质，他认为“名教”使人虚伪奸诈，争斗不已。“自然”才是大道之本，是道德之本。“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在他看来，“名教”是以控制和引导为主的，而人的本性是以顺从自然欲望为欢乐的。“抑引”是违背自然的，“从欲”则符合自然，所以人们自然欲望的获得并不是由于以抑引为特征的六经；保全人性，也不需要违背人们性情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这就揭示了自然与名教、人欲与六经的对立。既然如此，他认为应该抛弃儒家经典名教，“以讲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腐臭，……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 2. 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

“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后学，学以致荣，计而后习，好而习成，有似自然，故今吾子谓之自然耳。”嵇康认为，“六经”出现的客观效果是“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酿成了人们争夺名利之心，促使人们无意识的奔跑在名利之途上。所谓人天生就喜好学习六经，不过是他们“困而后学”“计而后习”的结果。“六经”是他们摄取名利的桥梁。这种现象“有似自然”，其实是“非自然之所出也”。

#### 3. 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制度。

嵇康认为人类社会应和“自然”一样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整体。人的行为出于自然，一切均合乎规律地运转着。这时的人“和必足于内，和气见于外”，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风俗纯朴。可人为的政治、礼仪破坏了秩序，扰乱了和谐，违背了“自然”的常规，于是，在社会上就有了种种强暴、欺诈和伪善。他在《太师箴》中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现实进行了揭露：“季世陵迟，继体承责。凭尊恃强，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在，莫劝莫禁，若乃娇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怨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嵇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封建君主制的实质不过是君主为其自身谋取私利的工具，戳破了历代君王“天下为公”，以“蒸民为念”的神话，另外，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还列举了官场制度中的种种虚妄形式，洋洋洒洒“七不堪二不可”，表面是与好友绝交，实质上是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宣战。

是什么可以让“不见其喜愠之色”的嵇康“遇事便发”地去批判和撕毁当时失真的“名教”？答案是对“任自然”的向往。

先秦时期，老子在《道德经》一书讲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站在宏大的宇宙视野上将“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认为“道”具有“自然”的属性，主张人也要像道一样顺应“自然”；庄子则创立了“无为逍遥”的人生哲学，号召世人从无谓的名利和生死情结中解脱出来，以求得心灵的豁达与安宁。嵇康远承老庄自然无为思想，近受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影响，提出了“任自然”的道德追求，试图建立一个自然安宁的道家世界。

#### “任自然”有以下几层含义：

1. 顺应人性。“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嵇康将“太素”当成宇宙的本源，即“元气自然”。认为人作为道德主体，其才能和性情禀自元气，不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加以改变，因此引出“人性自然”。同时对人的自然欲望加以肯定，“好安而恶

(下转第 277 页)

法都是经过前人反复实验验证和医疗实践中检验的结果。诸如在教学活动中,乳腺外科手术的乳腺癌根治性切除、改良根治术、保乳手术、乳房重建手术,其背后的发展过程、自身理论和实践方法均有自身完美的规律,都要一一向规培医师阐述和揭示,尽可能让他们掌握乳腺解剖、生理、病理的基本原则,肿瘤外科的治疗原则,培养他们对于医学研究的兴趣,让他们领略乳腺外科技术演变过程中所闪耀的美学思维和思想。这样才能焕发他们对于医学美的理解和追求,促使他们在医疗活动对美的实践<sup>[4]</sup>。

#### 4.4 灵活运用多样化教学方式

传统的讲授法教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教学活动的的发展和教学活动背景及社会的变化,逐渐显露出其与新理念下的现代医学发展不适应的一面。要学会在教学活动运用基于团队为团队的学习 (Team-Based Learning, TBL) 教学方法,基于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教学方法,基于案例为基础的学习 (Case-based learning, CBL) 教学方法,基于研究为基础的学习 (Research-based Learning, RBL) 教学方法以及迷你临床演练评估 (Mini-CEX) 等一系列新颖教学方法,力使抽象的理论变得更加具

体、生动和生动,更易于理解和记忆,力争达到最优质化的教学效果。

#### 结论

综上所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加强规培美学方面的培养,不仅是医学发展的需要,还是求医者对乳腺专科医疗工作者从业者的要求,也是当今乳腺专科的发展趋势,更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补充。当今,加强医学美学教育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实施势在必行。

#### 参考文献:

- [1]赵茹乔群岳颖乙苏北陈凛. 乳腺癌术后乳房缺损患者的心理调查[J].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2003(04):53-55.
- [2]郭塔, 吴灵. 乳腺癌乳房整形外科应用现状与进展[J]. 中国肿瘤外科杂志, 2018,10(03):141-146.
- [3]鲍柏军. 重视医学美学教育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J]. 中国交通医学杂志, 2005(03):301-302.
- [4]董莉, 王云飞杨. 改进美育课教学方法, 提升医学生审美意识[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05):90-92.

#### (上接第 232 页)

危,好逸而恶劳”,“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成,不待借而后有。”认为只有在“不逼”、“不扰”的条件下才能使人“愿成”,“志成”。

2.内在反省。嵇康肯定“人性以从欲为欢”,反对儒家礼法对人性的束缚,并不是鼓励人们声色犬马,放浪形骸。嵇康认为,那种无节制的放纵,对外在酒色名利的追逐,是“智用”的结果,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应该通过内省,于心灵的深外建立起约束自己的权威。“难曰: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虑而欲,性之勤也;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然则子之所以为欢者,必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也。无俟此而后为足,谓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于物,丧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论矣。”在《答难养生论》中,他区分了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者,并在两者的比较当中,进一步强调了人的自然之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为人的智用划定了范围,指明了方向。他认为人的智用只能用于对人的自然之性的认识,而不应矫饰助长它,否则就会使人性走向虚伪。

3.任心自然。在顺应人性与反对智用的基础上,嵇康渴望得到精神上的自由,主张静心养气,“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完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通达,故大道无违。”实现心中的大道;放下对功名的追逐,“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饮。”过一种清心寡欲,不受约束,随情所至的淡泊生活,追求一种“息徒兰阁,秣马华山;流瑞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美好境界。

嵇康虽然身处于荒诞无道的魏晋时期,但他的心却在自然安宁的“洪荒之世”里。在那里,“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者求食,怡然鼓腹,不知

为至德之世也。”而他自己也像弘达先生一般“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素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以纯真超然的心态面对纷争离乱的世间,以忠信笃敬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结语:本文认为,嵇康“越名教”的思想有超越、不拘泥名教的意思。魏晋时期,“名教”虽然不再是唯一引导人们进入崇高境界的道德阶梯,但其所包含的基本道德规范本身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面对司马氏统治集团借名教之名控制社会的行径,嵇康才化身斗士为道义发声。他认为名教应该建立在自然之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不应该成为一种外在的束缚,应该顺应人性的自由发展,进而形成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然而然的美德。也就是说,“越名教”是在寻求一种更完美、更高尚、更纯粹的仁义道德。嵇康不仅不是对名教的叛逆,反而是找到了通向真正高尚道德的道路。在他的身上有思考社会与人生的深沉、有对虚伪和高压政治的反抗、有向往自由的憧憬。不得不说,身逢乱世的嵇康活得真实且勇敢,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垂不朽。

#### 参考文献:

- [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92
-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
- [3]叶桂桐《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关系论析》,《济宁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1期
- [4]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 [5]高晨阳《自然与名教关系的重建:玄学的主题及其路径》,《哲学研究》,1994年第8期
- [6]杨国荣《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